



曾纪鑫
读解中国历史系列

历史的砝码

从边缘影响历史的 11 个人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历史的砝码

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

曾纪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的砝码 : 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/ 曾纪鑫著.
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7
ISBN 978-7-5108-4538-3

I. ①历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历史人物一生平事迹—
中国 IV. ①K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57886号

历史的砝码：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

作 者 曾纪鑫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8.5
字 数 24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538-3
定 价 4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苏颂：中国古代唯一的科技丞相 /001

苏颂以政治家立身，位居人臣之极——丞相；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，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。

俞大猷：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 /020

在当年抗击倭寇的东南沿海一带，“俞龙戚虎，杀贼如土”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；《福建通志·列传》也有“世言继光如虎，大猷如龙”之语。

李贽：另类思想家 /043

李贽性格倔强，思想活跃，不甘摧眉折腰，不肯受人挟制，不愿巴结奉迎，所受之磨难与屈辱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将大地为墨，难尽写也”。

黄道周：大明孤臣 /064

黄道周是知行合一的理学家、道学家，是少有的易学大师，是忠孝节义的榜样，是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的典范，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“硬骨头”，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……

郑成功：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 /089

郑成功以一介儒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，不得不面临多种痛苦而艰难的抉择，虽然勉为其难，但他竭尽心智，欲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于既倾，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洪承畴：千古贰臣 /114

这些降清汉臣中，唯有洪承畴做得最多，走得最远，最为彻底！他一旦降清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站在明朝的对立面，从清廷的角度设身处地，竭尽心智，出谋划策，以效犬马之劳，在某种程度上比清人还要清人。

施琅：复仇与超越 /148

复仇，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、支撑与动力。施琅原本就心高气傲、胸怀狭隘、睚眦必报，如今“枕戈谋复仇”，更是不择手段。

李光地：理学名相 /177

其实，理学家才是李光地的本色，他并不恋栈贪图禄位，自步入仕途，便多次告假还乡。但李光地又称得上一位优秀的政治家，连后来的雍正皇帝都称他“卓然一代之完人”，追赠太子太傅，祀贤良祠，此祠至今仍在。

陈化成：天风海涛铸英魂 /204

陈化成，这位从社会底层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一品大员，五十多年来驰骋海疆奋勇向前从来不知“退缩”二字，国难当头，他的剽悍、他的血性、他的阳刚、他的胸襟，决定了他的最后归宿只能是血战沙场，死而后已。

陈嘉庚：华侨旗帜 /224

陈嘉庚携巨资踏上了归国航程，与某些衣锦还乡的成功者相比，他的归来并非为了炫耀，而是投资教育，造福乡梓。陈嘉庚心中装载着的，是国家的振兴与富强，远远超出了个人与家庭的狭隘范围。

林语堂：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 /251

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与功绩，是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，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。”

后记：边缘的力量 /280

苏颂以政治家立身，位居人臣之极——丞相；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，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。

苏颂：中国古代唯一的科技丞相

一

苏颂以政治家立身，位居人臣之极——丞相；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，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。

在以官为本、以权为准的中国古代社会，科学技术属于不入流的“旁门左道”与雕虫小技。苏颂却能“两手抓，两手硬”，像他这样政治、科技并举的“双料冠军”，在中国古代社会，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人。他位于现今厦门市同安区的故居芦山堂，大门两旁有副楹联写道：“尚书御史翰林第，将相公侯科学家。”

苏颂活了八十二岁，别说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，即使在今天，也算高寿。表面看来，苏颂左右开弓，挥洒自如，游刃有余，其实，他的一生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“风光”。

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，每项科技发明的突破与成功，都要求发明者必须具备超人的秉异天赋，更得刻苦勤勉、孜孜矻矻，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努力。而在科学遭受冷漠与歧视的古代，哪怕科学家取得了成功，等待他们的也并非鲜花、荣誉与掌声，其成果难受重视，常常被束之高

阁，寂寂无闻。

即以做官而论，苏颂从政五十多年，历经五朝，受过迫害，蹲过监狱，仕途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。

苏颂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（1020），二十三岁考中进士，第二年任宿州（今安徽宿县）观察推官；后历任知县、馆阁校勘、大理寺丞、太常博士、正议大夫、吏部侍郎、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、刑部尚书等职，虽时上时下，辗转于婺州、亳州、杭州、濠州、沧州、应天府等地，但总体而言，还是不断往上升迁；直到宋哲宗元祐七年（1092）六月，年已七十三岁的他，擢左光禄大夫、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掌领尚书省、中书省政务，统管六部。隋唐时期，皇帝为了控制相权，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三个部分，宋朝沿袭如旧。因此，苏颂所任之职，即实际上的丞相。须发皆白的他，好不容易荣登百官之首，可不过大半年时间，即元祐八年（1093）三月，又遇党争，无辜受牵，遭到弹劾。洁身自好的他，认为高居相位，必须受到朝廷所有官员的尊重与拥戴，一旦出现物议，则应急流勇退。因此，他当即上书，主动请辞。宋哲宗、高太后一再挽留，苏颂毫不恋栈，连上三书，辞去相位，离开汴京，出知扬州。也就是说，他在丞相位上，待了仅仅九个多月。两年后，苏颂以中太一宫使的荣衔致仕，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病逝。

苏颂的政治生涯可谓跌宕起伏，但政绩平平。也许是活得太久，经历太多之故，他不露锋芒，不喜事功，处事精审，守成持重。当然，这更多的还是个人性格、内在修养等因素使然。

尽管没有突出的政绩，没有显赫的功勋，可苏颂忠于职守，为人正直，恪守法规，不奸不贪，两袖清风，堪称楷模。就连强调个人道德品行近乎苛刻的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朱熹，也对他盛赞、仰慕不已，撰文称他“道学渊深，履行纯固，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”，“惟公始终一节，出入五朝，高风响乎士林，盛烈铭于勋府”，“以是心每慕其为人”。

苏颂自二十三岁入仕，此后虽有升有贬，官职有大有小，但都在官场奔走。若予分类，他一辈子做过四种官，即地方官、中央官、科技官、外交官。

初入官场，苏颂最早担任的是地方官——宿州观察推官，第二年改任江宁知县。他一生做过五次地方官。第二次是颍州知州；第三次，先任婺州知州，后改知亳州、知应天府、知杭州；第四次权知开封府，再改知濠州、知沧州；第五次，也即最后一次，是辞去相位后出知扬州。

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”苏颂任地方官时，总是关心民瘼，体恤百姓，尽其所能地“惠爱于民”。比如他十分注重当地的水利设施建设，在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不久，马上奏请疏浚自盟、白河、圭河、刁河等四条河流，以防水灾；知沧州时，疏浚沟河、支家河等工程，以解除黄河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；在杭州知州任内，将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，这恐怕是当地最早饮用的“自来水”了；在淮南转运使任内，盐价上涨，又赶上一场饥荒，苏颂不仅降低盐价，还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，以致神宗皇帝对他赞赏有加：“苏颂仁厚，必能拊安吴人。”

苏颂以民为本的思想及关爱百姓的情怀，还反映在他创作的不少诗歌之中。如他因暴雨肆虐、农田受灾而哀愁：“滂沱连月雨，愁叹斯民病。已紊四时和，更伤群物性。陇麦将萎摧，况值风威劲。我愿天地心，慎举阴阳柄。庶令疵沴消，永保寒暑正。无复三月中，惨惨行冬令。”在《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诗》中，他对百姓的挚爱之情溢于言表：“直向岁寒期茂悦，肯同时俗论甘辛。优游且做江南令，惠爱于民此最亲。”

苏颂一生，与“五”似乎十分有缘，他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朝，五次担任地方官员，五次出任外交官处理民族事务。

苏颂参与的五次外交事务，或为伴送使，或任生辰使，虽职务有别，但都是出使辽国。他遇事镇定，随机应变，分寸有度，举止得体，每次都不辱使命。回国后，苏颂根据自己对辽国政治、军事、社会等方面的认识

识，为朝廷的外交决策建言献策。对此，《宋史·苏颂传》有所记载。当神宗皇帝问及辽国的“山川、人情向背”时，苏颂答道：“彼讲和日久，颇窃中国典章礼仪，以维持其政，上下相安，未有离贰之意。”他认为宋、辽两国，应继续和平相处。“神宗然之”，认可、采纳了他的外交建议。

出使辽国，苏颂收获颇多，他根据自己的出使路线及所见所闻、所知所感，创作了《前使辽诗》三十首、《后使辽诗》二十七首，记载辽国的山川风光、道路交通、农牧特点及风俗民情。这两组外交组诗，在宋人诗歌中可谓独一无二，除文学意义外，更具珍贵的史料价值。后来，他以宋辽外交往来的相关资料为基础，编写了一部名为《华戎鲁卫信录》的书籍。

苏颂担任科技官员时，广泛搜罗人才，发掘潜能，量才器使，既总揽全局，又身体力行，不辞辛劳，刻苦精研。他以科学的理论做指导，不迷信，不盲从，反复实践，终于攀上了时代的科学高峰。

北宋后期，政局动荡，党争十分激烈。苏颂为官之时，先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争；哲宗朝时，帝党与后党斗争激烈；新法遭废，守旧派受到重用，其内部又形成以洛阳人程颐等为主的洛党，以四川人苏轼、苏辙为首的蜀党，以河北人刘挚为领袖的朔党，三党互争，形同水火。其实，“党”在古代多为贬义，繁体字“黨”从“常”从“黑”，意为“黑帮”，常与“结党营私”“党同伐异”“党豺为虐”“群而不党”“党争”等连在一起。苏颂为官五十多年，历经庆历新政、熙宁变法、元祐更化等重大政治事件，各党各派都在争取他，比如王安石大刀阔斧地革除旧政，希望他能“加盟”改革派；苏轼是他的同宗之侄，曾与他一同坐牢，可谓患难与共，亲情加友情，蜀党自然极力拉拢他；刘挚与他同署办公，两人诗文互答，政见颇同，朔党将他视为同道……可是，苏颂不管是在地方任职，还是身居京城担任中央高官，始终坚持不树党援、不入派系、处事以公、不营私利、洁身自好的政治原则。

不介入党派系列，苏颂势单力孤，要想办成一点大事，形成规模效应，却无人支持响应，这，恐怕也是他一生政绩平平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二

苏颂孤身一人在风波险恶的官场奋斗，也就难怪屡经挫折了。纵观其政治生涯，曾有过两次生死考验。

第一次是宋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任知制诰时。

知制诰之官始于唐代，专为皇帝起草、撰写诸如册立太子、任免高官、宣布征伐等重要的诏书、文诰。知制诰又称内制，与起草一般诏令、文书的外制——中书舍人相对应。

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王安石颁布新法，受到朝野上下的争议乃至反对。朝廷亟须得到基层支持，于是，王安石的学生李定经人推荐被召至汴京，拟任命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。

宋神宗批示李定任职的词头之后，送中书省，正值右谏议大夫、知制诰宋敏求当班，宋敏求认为李定不符合任命要求，拒绝起草诏书，并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。神宗收到封还的词头，当即免去宋敏求官职，并御批道：“速送别官命草。”于是，苏颂被推到了“前台”。他没有被神宗的愤怒与权威吓倒，陈述李定任监察御史里行一职举荐失当的原因：资历不够，政绩不显，不符合选用擢拔规定，违反了宋朝选官旧制。因此，他不仅反对李定任官，还为宋敏求辩护。神宗态度坚决，命令又一当班的工部郎中、中书舍人李大临起草诏书，没想到李大临也封还了词头。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临三人的一致封还，被人称为“三舍人议案”。

事情并未就此了结，神宗第四次命令苏颂撰写任职诏书，苏颂依然封还；又第五次批送李大临处理，李大临毫也不屈服，拒绝听命。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，神宗自然不肯罢休，他召见苏颂，以商量的口吻望他“速为

草制”。苏颂不为所动，于是，神宗加重口气道：“久格诏命，恐将得罪，卿宜思之。”苏颂回道：“臣闻治道在察臣下之邪正，邪正之分，唯所操守。若臣前以为不可，今蒙陛下召谕，遂变前言，乃奸邪固位之臣所为也。”

神宗的任命被三舍人多次驳回，弄得极没面子，便找重臣商量对策。韩琦认为苏颂分量更重，不必再找李大临了。于是，神宗的词头再次送到苏颂手中。

苏颂依然没有妥协，在封还词头的奏书中，强调自己为了朝廷法制、个人职守，“不避斧钺之诛”；又说皇帝若依特旨行事，应有文字根据。当神宗堂札特批之后，苏颂仍坚持己见，建议先将李定置于京师别授一官，等有了政绩符合条件之时再任监察御史里行，并指出神宗的特旨是以言代法，甚为不当。

苏颂多次抗命违旨，神宗恼羞成怒，忍无可忍，终于免除了他的职务。同时免职的，自然少不了另一主角李大临。而李定也没有授任原定之职，而是改知银台通进司。

这一任命反反复复多达八次，双方僵持一月有余，最后以三舍人免职、神宗让步而告结束。

苏颂因恪尽职守、不为身谋，被称为“三舍人之冠”。其实，他这样做时，早已做好承受一切后果的准备，哪怕流放、坐牢乃至杀头也在所不惜。丢掉官职，在苏颂看来，其实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这也说明宋代皇帝多少还有一点宽容、开明与大度之气，若在刑罚严酷的明朝，苏颂违命不遵，不仅会被处斩，说不定还要牵连亲友，诛灭九族。

当然，他这样做，也为自己埋下了隐患，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——遭受迫害囚入牢笼，面临人生的第二次生死考验。

那是元丰元年（1078）五月，苏颂在权知开封府任上，遇到了一桩案子。

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父、主持行亲，说他将寺院的粥钱支给

了官员孙纯。苏颂了解到，原来是行亲花了孙纯的钱，孙纯讨账时，行亲手头拮据，就用寺院的粥钱抵债。孙纯遭到控告，马上将钱还给了行亲。苏颂认为孙纯讨账无可厚非，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，由主持支配也无不可。于是认定这是徒弟宗梵无事生非，扰乱风纪，便以杖责罚处。

一般来说，案子一结，事情也就过去了，没想到有人却拿苏颂断的这桩案子大做文章，被城皇卒参了一本，状告他偏袒孙纯。御史台官员舒亶审理此案，他是李定的朋友；而此时的李定，已升任御史中丞，是舒亶的顶头上司。“三舍人事件”虽然过去了八年，可李定总想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。机会终于来了，他自然不肯放过。于是，李定与舒亶密谋，制造了一起冤案。

舒亶经过审理发现，苏颂与孙纯乃亲戚关系。两人既为亲戚，就可定苏颂徇情枉法的罪名。

原来，苏颂的女儿刚刚嫁给同事李徽之子，李徽家族十分庞大，有数百人之多，如果“顺藤摸瓜”地牵扯，则可牵出孙纯是苏颂女婿李徽儿子的从妹之子这一“转弯抹角”的亲戚关系。苏颂当初判案时，并不知晓这一姻亲关系。于是，他被传讯到御史台，接受舒亶的审讯之辱。仇人为他寻出这么一个确实存在的远亲，哪怕百般冤屈，也有口难辩。于是，苏颂以故纵、偏袒孙纯之罪，受到惩罚——降职秘书监，出知濠州。

苏颂遭贬，离开京城赴濠州上任，可李定、舒亶却不肯罢休，对他继续加以迫害。一番策划，他们翻出苏颂元丰元年（1078）六月判决的另一桩案子——陈世儒案，送交大理寺重审。

这桩案子，因国子博士陈世儒的母亲被奴婢害死而起。陈世儒之妻李氏厌恶他的生母，常对奴婢们说：“博士母亲死后，愿意留下的，增加薪金；想要离开的，赠送银钱。”法吏审案时，认为李氏虽暗示奴婢杀母，但没有明言，情虽不容，罪不至死。作为主管官员的苏颂，其态度是不以行政干预司法，由法官以事实为准，依法判决。

案子了结上报，被大理寺驳回重审；再次上报，又被驳回，几经反复，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，就连神宗皇帝亦闻知此事。一次上朝时，神宗对苏颂道：“听说你和法官想对陈世儒一案宽大处理，奴婢杀母，此乃人伦大恶，要穷究到底，不可纵容。”苏颂回道：“办案当以事实为准绳，对当事人，我既不敢宽容，也不敢加重处罚。”

陈世儒案久拖未决，一直拖到苏颂受贬赴濠州任职也没有最后判定。此案一经翻出，苏颂便难以逃脱李定、舒亶编织的第二次罗网与冤狱。他们仍像上次那样，从亲友关系入手予以加害。一番摸排，李定、舒亶又拎出了一条特殊的关系网：苏颂与吕公著是好朋友，而陈世儒妻子李氏的母亲是吕公著的妹妹。这样一来，苏颂又成了罪人，且“言之凿凿”：原来他在好友吕公著的请托下，有意宽纵李氏，哪怕皇帝过问，也不予理睬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九月，苏颂从濠州回到京城。此次并非荣迁，而是以戴罪之身，受到押解，关在汴京御史台监狱。

凑巧的是，苏轼也因乌台诗案被关进同一监狱，苏颂在三院东阁，苏轼在知杂南院。两人仅一墙之隔，狱吏审讯拷打苏轼的声音，苏颂听得一清二楚。

更为巧合的是，乌台诗案这一冤狱也由李定一手制造，并亲自主审。

苏轼与苏颂曾一同反对李定任职，所不同的是，苏颂为“三舍人之冠”，苏轼则写诗反对。苏轼的诗名太盛，诗歌很快流传开来，弄得李定丢尽了脸面。此后，苏轼又为孝子朱寿昌出版的诗集作序，对他千里寻母的行为激赏不已。李定为了升迁，母亲仇氏逝世，也不肯守丧，还编出自己非仇氏所生的谎言。于是，在李定看来，苏轼表彰孝子，就是变相抨击自己。怀着一股刻骨仇恨，李定“鸡蛋里面挑骨头”，布下罗网，将苏轼笼罩其中。他对苏轼亲自审讯用刑，并不断扩大冤案，将司马光、孙觉、张方平等二十多人牵连其中。

由此可见，李定属真正的无耻小人，苏颂当初反对他破格提拔，当属



苏公祠

先见之明。

苏颂知道苏轼就在近旁，却无法联络互通声气，便赋诗四首表达心声，为苏轼声援，打抱不平。其中一首写道：“源流同是子卿孙，公自多才我寡闻。谬见推称丈人行，应缘旧熟秘书君。文章高绝诚难敌，声气相求久益勤。莫为歌诗能数昧，圣朝终要颂华勋。”

当然，苏颂自己也时时面临与苏轼相同的处境——审讯、追逼与拷问，还有利诱。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想扩大冤狱，许之以利，让苏颂诬告陈世儒一同参与谋杀。苏颂闻言，当即大义凛然地回道：“使某诬人，死不可为！”但凡关涉他本人的，则“大包大揽”地应承下来，为他人减轻罪责。

最后，苏颂冤狱在神宗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，才得以宽大处理：释放出狱，撤职归班。

三

朱熹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首仕泉州府同安县主簿时，离苏颂逝世不过五十多年，有感于他的故乡同安已不知其人，“虽其族家子不能言”，遂建苏公祠以作纪念。

作为理学家的朱熹，为立苏颂丞相祠堂，写了五篇相关文章，对其科技成果只字不提，他所看重的，是苏颂的平生节俭，公正清廉；他所弘扬的，是其道德修养，“然而始终大节，可考而知，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”；他建祠的目的，是振兴教育，扭转社会时风。

由于朱熹的提倡，苏颂这位乡贤渐为当地百姓所知，其学识风范也在不断地激励、鼓舞后人。

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，或遭兵燹，或遇大火，多次毁弃，又多次重建。如今的苏公祠修葺一新，位于同安孔庙之内。进入祠堂，供奉的苏颂半身纪念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：“存小心与宋千古，识大义惟公一人。”横批为“正简流芳”。正简，即宋理宗朝时对苏颂的追谥。

其实，苏颂之所以能够流芳千古，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推崇，主要在于他那卓越的科学贡献。

苏颂刚入中央做官时，先后担任馆阁校理、集贤校理、校正医书官、太常博士等职，其主要工作，就是编撰、校正古籍。他埋首其中，眷抄校勘，一干就是九年。其家中所藏古籍，大多为他亲手抄写。这项工作虽然枯燥乏味，但培养了他认真求实的科研精神、刻苦沉潜的科研作风以及扎实渊博的文献功底。

苏颂的主要科技成就，一是研制新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，二是主撰药物学著作《本草图经》。正是天文学、医药学这两方面的突出成就，使得他在科技方面独自一人创下七项世界第一。

水运仪象，天文学名词，专业性较强，即使今天，如果对天文学不感兴趣，一般人也难以弄清其内容与性质。仪，指浑仪，一种古代测量天象的器具；象，指浑象，一种球面星图，形状与地球仪相似，上面绘有星象图。水运，以一种漏水驱动装置，促使浑仪或浑象转动，与天上的恒星同步运行。水运仪象，是古人在天文观测中使用的一种人造计时器，现代称之为水力天文钟，其原理是以漏水驱动浑仪或浑象，自动计时。

早在几千年前，我国古人就设计了一种名为日晷（又称日规）的计时器，但它在阴天、夜间不起作用；而水运仪象，则是一种更为科学的，以非天文的物理过程作依据的计时器。

苏颂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，是将浑仪、浑象及报时装置组合为一体，由水力推动的天文仪器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苏颂建造的这座高约十二米、宽约七米的巨型天文



苏颂公园按原样复制的水运仪象台